

沈大德 吴廷嘉 著

黄土板结

——中国传统社会结构探析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社会史丛书

黄土板结

——中国传统社会结构探析

沈大德 吴廷嘉 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浙〕新登字1号

封面设计：池长尧

责任编辑：汪维玲

责任校对：朱晓阳

黄土地结——中国传统社会结构探析

沈大德 吴廷嘉 著

*

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杭州体育场路347号）

杭州云轩印刷厂印刷

（杭州东新路147号）

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8.375 插页2 字数19万

1994年11月第一版

1994年11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 001—2 000

ISBN 7-213-01097-2/K·291

定价：8.00元

编 序

历史学是一门古老而又常新的学科，有其自身的规范和功能；与此相观照，以再现过去为本旨的社会史研究的勃兴，体现了当代历史学演进的内在逻辑。

就历史认识的整个过程而言，“在第一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在第二条道路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马克思语）。由传统史学脱胎而出的社会史研究，正是以其整体史观的新姿，强调对历史“完整的表象”的研究。它既涵盖传统史学的研究领域，更关注社会结构—功能及其运行机制静态和动态的研究，从而进行人类历史景观的模拟复原，使之客观准确地成为检测现代社会的参照。

时下，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史研究尚处在摸索起步阶段，如何展开中国社会史研究，尚有赖于学界同仁的合作努力。为此，我们组织了这套《中国社会史丛书》，希冀其能起到抛砖引玉之效。顾名思义，这套丛书是以整个中国社会史为研究对象的，它涉及社会结构、社会阶层、社会团体、社会思潮、社会问题、社会生活等方面。它对我们今日认识国情，推进社会主义的改革事业是大有助益的。

我们深知，仅仅通过这套丛书，决不可能完成中国社会史研究的任务，即使所出的著作能否达到社会史学科所规定的要

求，也还有待专家的评判。故此，我们诚恳地期望读者和学者们给予批评指导。

《中国社会史丛书》编委会

自序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借曹雪芹之语，作作者的开场白，不禁百感交集。

从1981年以来，我和大德就决定，要认真探讨一下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及其超强聚合机制问题。我们认为，这个问题是认识中国国情与中国特色的关键，也是建设中国自己的社会学、历史学理论构架的基点。同时，它还是社会学与历史学、文化学的结合部，可以实验并推动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变革。十年来，我们进行过多次讨论，但由于种种原因，都始终未曾动笔成书。1991年秋，在浙江人民出版社汪维玲同志的支持和帮助下，我们写出了该书提纲与提要，迈出了第一步。然而，就在此时，大德因劳累过度，患突发性晚期肝癌猝然病逝。在垂危中，他还惦念着这本书。我曾在他的病房内，摆起了三个书桌，准备随时动手写作，以为能抢在他去世前让他看到书稿甚至书的问世，不料最终还是落了空。在他逝世的当天，我在他的遗体前发誓，一定要完成此书，了结他的宿愿，慰藉那孤寂、圣洁的在天之灵。

一年来，日思夜想、魂萦梦绕，是大德生前的情景和他的未完之作。我可以承受他离开我以后的种种打击，却无法释然于他的不幸遭遇——那一代英年早逝的中年学人的悲惨命运。他是中华民族祭坛上的牺牲，此书则是他的无字墓碑。书中的每一个字，都是我们的泪水；书中的每一句话，都是我们的血汗。它

们是大德思想的结晶，也是大德生命的延续；它们是我爱心的所在，也是我希望的寄托。

写到这里，我已是涕泪泗流，泣不成声。如果读者们能从此书中看到大德的见识与为人，看到他的拳拳赤子之心，于我就是最大的安慰。如果读者们能对本书提出批评指正，我深信，大德会在遥远的星空，同我一起表示诚挚的谢意与敬意。

导论：中国社会超强聚合机制的兴衰

中国的农业文明与传统文化，其鼎盛灿烂处于世界之巅。然而，另一方面，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停滞，也属于世界之最。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组成的国家，黄河、长江是它的母亲。而地处中原的黄土高坡，则是其主体华夏族(汉族)的摇篮。这个摇篮有过非凡的魅力与美丽。但是，在历史的长河中，它的团粒结构被破坏，成了一块凝滞不动的淤泥滩。探讨中国传统社会的结构及其演变过程，解开黄土板结之谜，就是本书的任务与宗旨。

本书的第一章，是探索中国社会的缘起及其特征，即通过所谓“寻根”的过程，重新认识和把握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历史渊源。在从蒙昧时代向文明社会的转换过程中，中国社会的最大特色是小农生产方式的初步确立与氏族组织形态的完善，它们是决定中国社会结构基本模式和运动态势的最早成因。

第二章研究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基石和立足点，即以家庭为基本劳动单位的小农经济、宗子继承制为辐射中心的政治统治方式与社会关系网络、以人伦中心和民本主义为特征的礼教文化。

第三章至第九章，从自然经济的高度成熟、中央集权专制制度、宗法制度、官僚制度、文化机制、大一统机制、国民性格及其社会观念形态等不同角度，分析了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基本特征与历史变迁，以及它们在不同历史阶段对中国社会所起的

不同作用。

第十章重点在了解传统社会中，上述主要社会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其整体运动特征，从而揭示中国传统社会超强聚合机制的形成原因与具体表现形式，这也就是黄土地结的谜底。

第十一章分析近代以来，传统社会结构所受到的内外冲击力，及其由此发生的畸变和它们在今日生活中的遗迹与影响。

本书力图以中国历史和现实中的实际情况为出发点，用现代意识与眼光，去系统探析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及其超强聚合机制的兴衰。这是中国在近现代化进程中，对社会进行实质性的结构变革而非仅限于形式变换的关键。从某种意义上讲，能否实现这一点，也是当今改革能否健康发展并最终成功的关键。为此，我们尽量注意本书在理论上的科学性、严肃性，尽量避免片面的对应性与盲目的实用主义。

在研究方法上，吸取自戊戌维新以来，中国学术研究不注意在中国土壤中扎根的教训，我们视国外一切有关学科的新理论、新方法和新成果为借鉴与工具，而不以它们为准则，更不以它们为出发点来建构本书的体系和体例。我们在把社会结构视为一个集合概念的基础上，以社会结构整体运动及其发展过程为经，以其大系统中的各个主要分支系统为纬，进行多学科的综合考察与动态研究。当然，这只是我们的主观愿望，实际结果可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果如是，则我们做一颗铺路石。

目 录

· 1	自序
1	导论：中国社会超强聚合机制的兴衰
1	第一章 寻根：回到女娲的怀抱
1	第一节 龙的传人
7	第二节 农为邦本
12	第三节 血缘纽带
20	第四节 巍巍华夏
24	第二章 磐石之基
24	第一节 家族本位制的确立
36	第二节 家族本位制的发展与作用
43	第三节 家族制的长期延续与社会意义
54	第三章 烂熟的农业文明
54	第一节 小农生产的内部结构特点
62	第二节 农业与其他经济部门的结构模式
73	第三节 长不大的萌芽
82	第四章 土地所有制
82	第一节 土地所有制的类型和特点
87	第二节 兼并风与均田梦
96	第五章 皇权专制与官僚政治
96	第一节 传统政治体制结构与演变过程
103	第二节 政治结构的组合机制与历史渊源

109	第三节	政治体制与官僚政治的特点
114	第四节	传统政治机制与社会后果
118	第六章	社会成员与社会关系
118	第一节	流动而凝滞的阶级与阶层
129	第二节	无所不包的社会关系网络
135	第七章	教育与人才
135	第一节	传统教育机制及其演变
140	第二节	科举制的日出与日落
144	第三节	典型解剖:清代科举制特点
152	第八章	文化机制
152	第一节	从百家争鸣到文化大一统
160	第二节	儒家学说的演变与改造
171	第三节	礼文化
176	第四节	多元文化的撞击与整合
184	第五节	传统文化的特质及社会影响
189	第九章	国民性透析
189	第一节	国民性的提出与探析
195	第二节	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
207	第三节	国民性的二重表现及社会后果
220	第十章	传统社会超强聚合机制
220	第一节	超强聚合力的形成与运动
233	第二节	中国与西方社会之比较
239	第十一章	转型中的二重变奏
239	第一节	痛苦的转型
246	第二节	社会结构的新变动与新因素
253	第三节	浅层变革与深层复旧
257		结语

第一章 寻根：回到女娲的怀抱

第一节 龙的传人

“遥远的东方有一条江，
它的名字就叫长江；
遥远的东方有一条河，
它的名字就叫黄河。

.....

遥远的东方有一个国，
它的名字就叫中国。
遥远的东方有一群人，
他们全都是龙的传人。”

——侯德健

一首《龙的传人》，风靡了全世界的华人，倾倒了全世界的华人，也震撼了全世界的华人。中国，龙的故乡；中国人，龙的传人；黄河，龙的腾飞地；长江，龙的母亲河。那曾经孕育过五千年古老而灿烂文明的中国，那如今背负着沉重历史包袱步履维艰的中国，究竟是怎样一个国？那曾经站立在中世纪世界文明之巅的中国人，那如今滞行于世界赛场起跑线后面的中国人，究竟是怎样一群人？为了建设今天，为了展望未来，我们循着历史的轨迹，寻根探源，觅求一个相对清楚而清醒的答案。

在实际生活中，在动物种属及其漫长演化过程中，龙并不存在。从历史学和民俗学的角度上解释，龙也只是蛮荒时代先民们的一种经过神化的图腾崇拜。有趣的是，龙是多种图腾崇拜，也即多个氏族或部落族徽的综合结果。龙兽头、牛(羊)角、蛇身、鳞甲、鱼尾，潜渊跃云，呼风唤雨。从古代绘画资料和口碑资料看，龙的原始色彩系土黄色，后来则随着部落酋长向帝王的过渡，也鎏金重彩地尊贵起来，浑身光闪闪，亮灿灿，并由其在地上塑造的天国幻影中，所处环境和所司职务的不同而有了其他的颜色。更有趣的是，龙的蛇身、鳞甲、鸟爪、鱼尾，还有传说中居住的水晶宫及其行雨行水的功能，都说明它是一位经过艺术加工后的水神，其黄色则正是我国中原土地的颜色。显然，龙与原始先民们中的农业部族直接相关。

剖析这一时期有关我国先民生存发展状况的神话传说，是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居住于天地中央的大神女娲，用泥土造人，补天治水，人类得以繁衍。内中透露出的历史内涵，除了母系社会的权威之外，其实就是我国中原地区诸部族，都源于同一个祖先。在另一个传说中，女娲与人头蛇身的太皞(即伏羲)乃系夫妇，在山东发现的汉代画像石上还刻有同为人头蛇身的女娲与伏羲的交尾画像。伏羲氏住河南，其后裔广布于山东。值得注意的是，《易·系辞》载他“王天下……始作八卦……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白虎通》则载他“仰观象于天，俯察法于地。固夫妇，正五行，始定人道。画八卦以治下，治下伏而化之，故谓之伏羲也”。

“王天下”且“治下伏而化之”，说明伏羲是一个威望赫赫的部落联盟大酋长。发明“网罟”，“以佃以渔”，喻示了伏羲所辖部族已是渔猎与农业经济并重。发明八卦，是伏羲氏族对中国古文化的巨大贡献，这实际上是先民们对整体宇宙观和辩证法的最初

总结。八卦与阴阳天地五行概念的产生,可以看成是中国最早的哲学范畴。八卦符号,也是由结绳记事到文字抽象的一个关键性中介环节。而女娲与伏羲的关系,一方面是族内婚形态的反映,另一方面则说明伏羲氏族居于华夏“正宗”始祖的崇高地位。

“包牺(即伏羲)氏没,神农氏作”^①。神农一说为炎帝,居住于陕西一带,其后进入河南、河北,图腾为牛头人身。他“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农作”^②,并亲自“播种五谷,相土地宜燥湿肥硇高下,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辟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③。继神农之后而兴起的是黄帝族,其图腾崇拜为云,也与水和雨直接相关。他们居于新郑一带,系河南中心。黄帝(即轩辕)“剡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服马乘牛,引重致远,以利天下”;“重门击柝,以待暴客”^④,是舟车、宫室以及杵臼、弓矢、历法、文字的大发明家。其妻嫫祖发明了蚕丝。这些传说标志着黄帝族已进入农业定居生活。而黄帝更大的功劳则在于“以玉(石)为兵”^⑤,“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⑥,并在河北涿鹿执杀南方蛮族九黎部落联盟首领蚩尤,把农业定居的生产生活方式推广于整个黄河流域。

传说中的黄帝生子 25 人,其中 14 人得 12 姓(内中有两对兄弟同得一姓),这实为黄帝族衍生出新的 14 个部族。他们往往以居住地为姓,但不少姓带女字旁,又反映了从母权制向父权制过渡时期的遗迹。黄帝子孙中出了不少华夏族的圣贤人物。

①④ 《周易·系辞下》,见《黄侃手批白文十三经》,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45 页。

② 《白虎通德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年版,第 11 页。

③ 《淮南子·脩务训》,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208 页。

⑤ 《越绝书》卷 11,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80 页。

⑥ 《史记·五帝本纪》,中华书局 1959 年版,第 3 页。

其子亥器居河南西亳(今偃师县),后裔帝喾(号商辛氏)生子弃、契、尧、摯,尧是众所周知的圣王。弃、契分别为周族与商族的祖先。摯向东发展,与伏羲氏文化融合,称为少皞,图腾为凤鸟,这正是中国龙凤崇拜的由来。黄帝另一子昌意,生于若水(今四川雅砻江),居帝丘(河南濮阳县),向南发展,是中原文化与西南巴蜀文化、南蛮文化、吴楚的巫文化、湘粤的苗、黎文化及东南的夷文化的交汇点。昌意的后裔颡顼(号高阳氏),是舜和禹的祖先。黄帝功劳如此之大,也就理所当然地被后人奉为华夏民族的正统正宗。司马迁在《史记》中,推其为远古王帝之首。连黄色也得以沾光,成了其后历代帝王特别偏爱的颜色。

关于黄帝、炎帝的传说很多。还有的传说炎黄二人本亲兄弟,炎帝居姜水得姜姓,黄帝住姬水为姬姓。也有传说炎帝是西戎羌族的首领,与黄帝联合擒杀蚩尤后,又与黄帝激战于阪泉,败后退往南方。但不管哪一种传说,都反映出我国先民在众多部族相互征战与相互融合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以炎黄二族为主体的华夏族。而炎黄二族的胜利,正是中原农业定居文明的胜利。以《易》学解释,黄帝居中,属土,色黄,正是黄土地的象征。农业离不了河水与雨水,在神话中掌管此权的、集合各个部族图腾标志的龙,也就成了华夏族共同的族徽与护符。

分析远古时期的考古发现,也很能说明问题。在我国云南开远和禄丰两地,分别发现了森林古猿、腊玛古猿化石,在湖北建始县,还发现了类似南方古猿的牙齿化石。这些迹象表明,我国大体在人类起源地之内。在猿人方面,我国有云南元谋猿人、陕西蓝田猿人、北京猿人。河南召县、安徽和县、辽宁本溪,也发现了猿人化石。山西芮城匭河村、垣曲南海裕以及平陆、陕西潼关、河南三门峡、贵州黔西观音洞、辽宁营口金牛山,也都有猿人活动过的文化遗存。智人时期,则发现有陕西大荔人、山西丁村

人、许家窑人、广东马坝人、贵州桐梓人、湖北长阳人、北京周口店人、辽宁喀左鸽子洞人等。新人时期的文化遗址就更多，遍及20余省区50以上县市。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编的《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①所载不完全统计资料推算，仅自1949年以来，到1982年止，发现的有关旧石器时代遗迹已将近400处。

新石器时代的遗迹，我国考古工作者发现有位于黄河流域的磁山文化(公元前6000年至前5600年间)、裴李岗文化(公元前6000年至前5600年)、仰韶文化(公元前5800年至前2700年左右)、龙山文化(公元前2800年至前2000年)、大汶口文化(公元前4300年至前2400年左右)、马家窑文化(公元前3000年至前2000年)、齐家文化(公元前2000年左右)等。

同黄河流域一样，长江流域也有大量新石器文化发现，它与黄河流域同为我国古文明的发源地。其先后有大溪文化(?至公元前4000年左右)、屈家岭文化(公元前3000年左右)、青莲岗文化(公元前3500年至前2000年)、河姆渡文化(公元前5000年至前3500年)、马家浜文化(公元前4500年至前3000年)、良渚文化(公元前3100年至前2250年)等。

在北方，有红山文化、富河文化，以及广布于黑龙江、辽宁、内蒙直至新疆的细石器文化。南方的福建、两广、四川也发现了与中原地区文化性质和类型相近的文化遗址。云贵、西藏、新疆等地的有关发现，形态则较原始。

这些文化遗存数量之巨、地域之广、内涵之丰富，非常惊人。它们各具特点。仰韶文化又称彩陶文化，大汶口文化骨雕工艺发达，河姆渡文化木器制作工艺水平较高。有的同一文化中，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编：《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本书所引用的考古资料未注出处者均出自该书。

还有好几种不同类型。仰韶文化中的半坡型、庙底沟型、西王村型，分布于关中、豫西和晋南地区，陶器以红陶彩绘为主；而分布于洛阳、郑州的王湾、大河村型，则盛行白衣彩陶和双色彩陶；冀南、豫北的后冈类型、大司空类型，灰陶占了相当比重。这些文化有的前后传承，如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大汶口文化与龙山文化、大溪文化与屈家岭文化；有的则平行发展，如河姆渡文化与马家浜文化、河姆渡文化与青莲岗文化等。这些文化相互影响，交错发展。屈家岭文化曾延伸到黄河流域，而其本身又汲取了大汶口文化的某些特点。

耐人寻味的是，这些文化中，覆盖面最广、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正是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及其以后的龙山文化。它们不仅遍布黄土高原、华北平原，且对长江流域、珠江流域、东北与西北的细石器文化和东南沿海、西南边疆的文化形成及其发展，也有相当的作用。此外，这时期的文化都有一些共同特征：即均开始以农业定居为主要经济形态，皆逐步从母权制向父权制转化，都渐渐在氏族或部族内部发生了阶级对立和贫富分化的早期萌芽。黄帝族文明的胜利显然在考古发现中得到了某种印证。

考古工作者对我国石器时代人种的体质特征和种系属性，也进行了分析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属于蒙古人种的发祥地。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远古居民属于蒙古人种东亚型与南亚型。东南沿海一带远古居民则具有一些现代赤道人种性状，可能接近于蒙古人种的南部边缘型。在同一型中，他们又分属于不同的族群，如黄河中游的仰韶文化居民和山东、苏北一带的大汶口文化居民。到仰韶文化晚期向龙山文化过渡的庙底沟型居民，则兼有这两个族群的体征。这从另一侧面反映了我国先民属于同一祖先，但由于所处地理人文环境的差异，造成了具体形态的多